

与政府的爱憎关系：西南联合大学的时代风骨（*）

（第一作者）曹艺凡¹（共同第一作者）邓泽伟² 刘敏³（共同通讯）盛创新²（通讯作者）童锋⁴

（1.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广州510632；2.暨南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处·广东广州510632；3.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632；4.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摘要：20世纪上半叶，作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策源地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强调学术服务于国家使命。因此，日军对它们进行了特别的报复。1937年7月29日，日本飞机轰炸了天津南开大学。翌日，日本的大炮轰毁了残存的校园。清华大学被日军掠夺一空。战争迫使高等教育给军事工作让路，但是他们继续追求学术的宗旨至死不渝。清华、北大和南开起先避难到湖南长沙，随后迁往云南昆明，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之初期，面临水土不服、经费不足、设备匮乏、生活困难等问题，但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仍继续认为他们自己既是现代西方学术自由、又是中国政治道德的楷模，由此发动了一二·一运动等学群运动，昆明也成为昆明知识分子的“恐怖世界”的中心，并相继爆发了李公朴和闻一多惨案。对政府爱憎关系并由此所形成的政治道德一直是西南联合大学知识精英辩论和斗争的时代主题。

关键词：西南联大；爱憎关系；政治道德；时代风骨

作者：（第一作者）曹艺凡，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化史研究；（共同第一作者）邓泽伟，暨南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处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刘敏，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共同通讯作者）盛创新，暨南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处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通讯作者）童锋，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

一、研究的缘起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西南联大(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的相关研究，开始改变以往的“唯政治论”的研究路径，逐渐将研究视野扩展至社会下层民众，即“历史眼睛往下看”，如对知识分子群体、学生等群体的研究等。毋庸讳言，学术研究须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若调整研究视野，反思既往研究的视角和路径，西南联大研究仍有相当空间。

2018热映的电影《无问西东》(Forever Young)依托清华大学建校百年的历程为故事蓝本，讲述了从上世纪20年代直至现代，四个不同时代的年轻人共同经历青春、面对选择的时代风骨。而影片片名四字，也正是源自清华大学的校歌“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影片片尾更记录了像梅贻琦(Mei YiQi)、梁思成(Liang SiCheng)、林徽因(Lin HuiYin)、徐志摩(Xu ZhiMo)、钱钟书(Qian ZhongShu)、朱自清(Zhu ZiQing)等出自清华大学，并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名人与国学大师们。他们的卓绝风骨影响了中国近百年的文化。《人民日报》更是多次力推影片，并发文点评，称《无问西东》“拍出了时代风骨。”其中所饱含的家国情以及中国风骨与育教，无一不引起观众的共情情怀，令人为之动容落泪。一个民族若没有信仰，便没有一往无前的力量，亦丢掉了时代所赋予的历史责任。

民国时期(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知识精英参与国家政治的角色是多元“救助”者的角色。1912年开始，民国培育出了以作家、艺术家和其他非政府公职的职业人员等为代表的新城市知识阶层。知识精英从幕后走上台前，成为革命的政治领袖，军人在“训政”中也获得了教育。⁽¹⁾一批从香港学成归来

(1) [美] 费正清,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 王建朗等译.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536-602.

的知识精英成为拥有港英法学学位的律师、外科医生。一些知识精英在20世纪初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liberalism)，当他们在国外学成归来时，便把这些思想带回中国，诸如“科学救国”等等。纵观20世纪，知识分子作为国家的忠诚服务者和作为自由的学者专家这两个角色一直存在着对立，其冲突的焦点在于他们对政府的爱恨关系上。民国时期的知识精英不仅显示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才能，还显示出他们能在一个政治上分化、文化上多元化的旧秩序中担任重要角色的能力。即使在战争期间迁移昆明(KunMing)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时，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和南开大学(Nankai University)教授仍继续认为他们自己既是现代西方学术自由、又是中国政治道德的楷模。

二、高等教育给军事工作让路：西南联合大学之筹建

大学曾经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策源地，日本军队(Japanese Army) 对它们进行了特别的报复。1937年7月29日，日本飞机轰炸了天津南开大学。翌日，日本的大炮轰毁了残存的校园。最后，他们用煤油纵火焚烧废墟，以彻底毁灭这一抗日中心。北平的清华大学先被日本抢劫者有计划地掠夺一空，然后它的建筑物被改成皇军的一座座兵营、医院、酒吧、妓院和马厩。其他在上海(ShangHai)、南京(NanJing)、武汉(WuHan)和广州(GuangZhou)的大学都屡遭轰炸。⁽²⁾战争迫使高等教育给军事工作让路，但是他们继续追求学术宗旨至死不渝。1938年学术界已经接受了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的任务，认为这对中国的未来是必要的。在大范围的军事动乱和人民流离中，主要大专院校选择了迁往内地较为安全地区的战略。例如，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三所大学：清华、北大和南开先避难到湖南长沙(Changsha, Hunan Province)，并在那里建立了一所联合大学。⁽³⁾但是，到1938年2月，学生们和全体教员不得不再次迁移至云南昆明。第一批乘火车和轮船取道广州和河内。第二批由257名学生和11位教授组成，基本上是步行，跋涉2000多公里到达新校址。从物质和心理方面看，更具毁灭性的是被损害或破坏的校产的损失并非由于战争的机运，而主要由于日本军人的蓄意行为。战争开始时，以南开大学为目标的轰炸使它沦为一片废墟，这一破坏已广为人知，但几乎所有的其他学校在日本占领期间也因轰炸或破坏性使用，而蒙受财产损失。⁽⁴⁾

相比之下，官方报告的1940年国家直接税收收入仅为92441020元。⁽⁵⁾然而面对如此重大的破坏，学校生存下来了，并努力继续发展。恰在数量增加之时，严酷的战时条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学术活动的质量下降。院校总数从1937—1938年的低点91所开始上升，超过了1936-1937年的水平。⁽⁶⁾为了弄清所迁学校在八年战争期间的的作用，让我们看一下其中最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整个学术界顽强坚持是支撑战时教育的关键因素。1937年秋，即当战争扩大到中国更多地方时，联大的课堂教育恢复了：长沙临时大学以其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师生之众，于11月1日开课。校舍一部分是借用的房屋，一部分是计划中的未来清华大学农学院的校舍，恰在长沙城外，是战前不久获得的。然而，在秋季学期结束时，日本人更迫近长江中游地区(The lower-middle reaches of the ChangJiang Rive)，学校决定迁往西南边陲省份云南(YunNan Province)。没有人提问如此远距离、大规模搬迁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是否适当：高等教育机构显然是国家最有价值的资源，所以只要形势允许，当然必须抢救和重建。

1938年秋，师生在云南昆明重逢(由于容纳不下，文学院和法学院已先在蒙自住了几个月)。大约300名学生，由几个教授随同，从长沙步行两个月，行程近2000公里，而更大的队伍则乘车船绕道香

(2) [美] 易劳逸·薛光前编. 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 1937-1945年[A]. [美] 费正清.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623-687.

(3) 称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4) 陈立夫. 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3: 22-26.

(5) 欧元怀. 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J]. 中华教育界, 1947(1): 7.

(6) 陈立夫. 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3: 3.

港和滇越铁路到达。人员会齐之时，联大随之诞生。⁽⁷⁾同时，还举行了入学考试，招收一年级新生，以扩充来自华北的现有学生队伍。联大教员包括中国一些最有名望的学者。到1940年，注册学生增加到3000多人。学生的增加迫使联大于1940年开始在四川叙永建立新生分校。昆明的设施负担过重，既有借自当地学校的旧建筑，也有在1938-1939年仓促建起的廉价的“新校舍”。在原有的文学校、理学院、法商学院和工学院等四个学院之外，增加了师范学院，课程的范围也扩大了。⁽⁸⁾蒋梦麟(Jiang MengLin)、梅贻琦和张伯苓(ZhangBoLing)，他们分别是战前北大、清华和南开的校长，显示了政治家的风度和分工合作才能。蒋和张在重庆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与政府保持经常联系以照顾联大的利益，而梅则在昆明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教师努力从教，同时使自己的学术工作适应极不相同的地理环境和知识环境。例如，社会学家费孝通(Fei XiaoTong)已重新就职于省立云南大学(YunNan University)，虽然有时也被邀在联大讲课，但他把对长江下游农村的研究转移到考察中国西南(Southwest China)的少数民族；南开经济研究所(Nankai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切断了与华北(North China)基地的联系，转而发掘不发达的内陆的经济。

西南联合大学筹建之初遇到诸多难题。第一个难题是水土不服的问题。几百万难民的涌入，深深地影响中国西部(West China)的省份。⁽⁹⁾在当时，内地省份是与世隔绝的，它们仅仅从沿海地区接触到近代化的影响。相比之下，许多难民来自富有阅历的中等和上流阶级，习惯于财富、权力和现代舒适生活。他们常常屈尊俯就那些习惯古怪、语言难懂的比较土气的本地人。他们也怨恨当地的商人和房主索要歧视性的价格和租金。另一方面，当地居民怨恨下江人⁽¹⁰⁾的架子和傲慢。新来者确实试图垄断政府的主要职能，攫取对金融贸易和经济的全面控制权。政府机关和工厂中令人钦羡的工作拒绝雇用本地人，下江人认为他们懒惰和笨拙。几年过去后，语言上的差异不再阻碍本地人与难民之间的交往了，互相通婚愈来愈寻常，而且价格上的双重标准也大量消失。然而本地人对工作和社会地位上的歧视的不满，直到战争结束还没有完全消除。⁽¹¹⁾第二个难题是办学经费严重不足。1944年，拨给高等教育的经费总数已达180亿元（1937年为3000万元），但它的真正购买力只相当于1937年期间的180万元。40年代末期学生人数较多，学校也较多，这意味着质量急剧下降。⁽¹²⁾从总体看，在战争年代数量的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质量的提高，虽然在某些学校某些专业领域的大学教学仍设法保持世界标准的高水平。从1941—1942年开始，教育部对大学员工进行个别正式登记和任命的政策也引起了争议。⁽¹³⁾第三个难题是怎样获得图书和设备的问题。随着战争的延续，严重的实际困难加剧了。经抢救并运到云南的远远不够，而新的供应品又难以获得，特别在1940年滇越铁路(Yunnan-Vietnam Railway)中断之后。1939-1940年国民政府提供了100万美元为各大学购买图书和设备，但到1945年“仍未全部到达”。政府下令中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应只用国产品作实验以便把进口货留给大学实验室，但是这些措施远远不够。⁽¹⁴⁾这类物资匮乏使科学和技术科目的课程作业质量下降。同时，图书馆书本不足使大多数大学课程严重依赖课堂笔记和基本教科书，结果教学双方都受到严重的限制。第四个难题是师生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由于通货膨胀恶化，教授的创造力常被转向维持生计。政府特许教育和公务人员每月以固定的低价购买定量的大米。⁽¹⁵⁾许多大学生处境更为困难。战争初期政府开始向与家庭切断联系而确实贫穷的学生提供贷金，到1941年16000多

(7) 约翰·伊斯雷尔的西南联大校史原稿。

(8) 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A].西南联合大学[M].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25-39.

(9) 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M].纽约:兰多姆出版公司,1941:149.

(10) “下江人”，是四川人对长江下游省区的人的一种称呼。

(11) 史国衡.昆厂劳工：中国进入机器时代[M].波士顿:哈佛大学出版社,1944:9-12.

(12) 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J].中华教育界,1947(1):12-13.

(13) 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J].中华教育界,1947(1):12-13.

(14) 孙斌.朱家骅先生言论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社,1977:173.

(15) 梁实秋.谈闻一多[M].香港:香港经纬书局出版社,1967:109.

名学生接受过这种帮助。(16) 补贴仅能使接受者勉强维持生存, 整年食不果腹, 衣不蔽体, 更不用说书籍和其他必需品了。1941年初, 联大有一种说法, 抵押冬衣买春季用书, 然后在秋季抵押书本赎冬衣。

随着全面抗战到来的还有政府对高等学校控制的日益强化。抗战开始后, 南京国民政府(Nanjing KMT Government)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 在“集中”、“划一”的基调下, 在治理大学方面采取了一些制度, 其影响较大的制度包括统一和联合招生制度、学分制度、考试制度、点名制度、施行贷金与公费制度、总考制度、推行教员资格审查制度等。这些制度由于脱离了大学发展的实际需要, 违反基本的办学规律, 引起师生们的强烈不满和反感。(17) 此外, 政府人员还强调对学校人员加强思想与行政的控制, 如当时教育部要求院长以上行政领导必须加入国民党。而由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组成的学术人员, 他们认为, 如果学校院长以上行政领导都成了国民党员, 其结果必然是: “这帮不学无术的‘先生’们给学校带来的不是尊师重道的学风, 而是互相倾轧的恶习; 不是品德高尚的人格, 而是秘密侦探的特务作风。”(18) 大学自身内部渴求自由发展与外部政府加强控制交织在一起, 使得矛盾和冲突层出不穷。

从西南联合大学筹建过程来看, 足以体现民国知识精英对现政府的爱憎关系。民国知识精英把自己视为现代中国建设者之一。建设国家的努力现在不得不用战时极为珍贵的资源来实现, 这一事实加剧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专政之间的目标分歧。由于昆明物价的上涨高于其他地方, 政府的配给在联大益显不足。反对国民党独裁的联大教授从地方军阀云南省主席龙云得到支持, 他们阻碍了中央政府代理人控制大学校园政治思想的措施。在这种形势下, 表面上对实际问题的分歧有可能导致观点上的分化。例如, 1940年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表达了对政府以损害人文学科为代价过于强调大学课程的功利主义部分的不满, 他说: “大学的基本目标是求知, 它不是功利的。”(19) 这个声明显示新文化运动固有的两重性: 哪一个更重要, 是通过知识的追求发展个人的心智, 还是为了民族的集体目的而使用有用的知识? 高级研究的困难与高等教育类似。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所重新安置在数处, 包括昆明、重庆(ChongQing)和四川(SiChuang Province)的其他地方, 在那里科学家和学者尽其所能进行研究。战争早已把中国高等教育驱出了具有外国色彩的象牙之塔。

面对蒋介石对高校实施的高压和控制政策, 西南联大与之进行了诸多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努力。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是西南联大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 同时又是委派校长的主体, 学校和政府之间必然存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但是, 西南联大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追求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 其突出表现为校长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和教师反对行政力量决定教学安排和课程设置。(20) 西南联大也非常注重宽容精神, 它在政治上包容各党各派的教授与学生, 如闻一多(Wen YiDuo)、曾昭抡(Zeng ZhaoLun)、潘光旦(Pan GuangDan)、费孝通、张奚若(Zhang XiRuo)、陈序经(ChenXuJing)、冯友兰(Feng YouLan)、钱端升(Qian DuanSheng)、陈岱孙(LuDaiSun)等教授, 在政治上有不同见解, 但并不影响彼此之间在联大一起共事。(21) 三校学生中有中共地下党员, 有中间分子, 也有国民党的“三青团”(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Youth League)分子, 但追求民主自由成为主流。尤其是随着抗日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物价飞涨等问题引起人民的日益不满, 不但中间学生逐渐向中共靠拢, 部分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也对政治采取超然态度。此外, 西南联大各种社团众多, 言论活跃, 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社尤具号召力。(22) 这些都使得蒋介石对西南联大的民主思想、学术自由十分反感。特别是当其政治目

(16) 丁致聘. 中国近七十年教育记事·最近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1990: 30.

(17) 董泽芳, 吴绍芬. 西南联大调适学术文化与行政文化冲突的经验与启示[J]. 高等教育研究, 2016, 37(11): 92-97.

(18) 曲士培. 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553-554.

(19) 钱端升是联大政治学教授, 引自约翰·伊斯雷尔的手稿。

(20) 王蔚清. 西南联大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研究[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5(02): 108-114.

(21) 谢泳. 西南联大的启示[J]. 读书, 1994, (12): 94.

(22) 雁寒. “西南联大现象”再认识[J]. 创造, 2005, (7): 12-13.

标与西南联大自治需要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时候，蒋介石(Chiang Kai-shek)甚至通过武力手段镇压和迫害西南联大的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23)发生在昆明的一二·一运动(the December-First Movement)则是西南联合大学与政府间观点分化冲突到极致地表现。

三、学群运动的中心：西南联合大学之斗争

西南联合大学受惠于它非同寻常的高质量的教员和龙云的政治保护。昆明也是滇缅公路和从印度“飞越驼峰”的空中运输线中国一方的终点。龙云(Long Yun)控制下的云南省是聚集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周围的民国知识精英和不满的政治人物的避难所。不过，大多数大学屈从于陈立夫(Chen Li Fu)的压力。陈立夫控制的国民党秘密警察花很大力量注意学术团体，并威吓大多数教授。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所有校园里都有基层组织，其热心的成员充当了告密者。在学生示威和政府反示威的过程中，爆发四次全国瞩目的学群示威运动。

发生在昆明一二·一运动是其中规模最小的一次学群运动。1945年12月1日，四名年轻人被几个企图恐吓反内战抗议者的匿名凶手所杀，还有几人受重伤。作为这一暴力行动的结果，以西南联合大学校园内反战集会为开端的抗议活动，终于以这一时期第一次主要抗议运动而闻名。当1945年11月昆明学生领导反内战示威时，云南的政治气候已在变化；云南省长龙云虽然在战时与中央政府合作，但也保护了学术界。战争一结束，对该省的权力之争接踵而至。龙被斗败，重庆政府以卢汉(Lu Han)取而代之，卢汉同意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更多的权力。所以学生的反内战运动使他们与国民党当局发生正面冲突，当局采取迅速行动，禁止表示任何不同政见。在学术界和自由职业界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主同盟采取了支持学生的坚定立场，并要求建立联合政府。11月末，阵线已经分明。联大学生于11月25日领导了一次大会，抗议国共重开内战，但被武装军队驱散。当时政府仍在重庆与中共领导人谈判，它断然声称反战情绪是共产党煽动的。然而，学生们坚持斗争，12月1日，一帮武装分子，其中一些身穿军服，侵入了几个校园，这时几乎昆明所有的大中学生都被卷入这次大示威的计划。战斗爆发了，石块对抗枪械和手榴弹。战斗结束时有三个学生和一名音乐教师被杀，十几名学生受伤。(24)

1946年，昆明正在变成知识分子的“恐怖世界”。首先，谣传政府已列了一份“黑名单”，然后发生了两起对两位教授的暗杀：李公朴(Li Gongpu)于1946年7月11日被害，而闻一多于7月15日在一次公开悼念李的大会上发表一篇激动人心的讲演后被害。(25)10名民盟其他领导成员，包括潘光旦教授(清华教务长)，费孝通(人类学家，云南大学)和张奚若(政治学家，联大)立即前往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避难，直到他们的安全得到一个来自重庆的特使保证为止。(26)以西南联大知名教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于1946年9月在《观察》(Observation)上，通过发表言论做最后抵抗。主编储安平(Chu Anping)得到来自像十几年前曾向《独立评论》(Independent Review)投稿的那样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支持。为当时最受重视并广泛传播的日报——《观察》第一期写作的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学术领袖：清华经济学教授伍启元(Wu QiYuan)、南开历史学教授蔡维藩(Cai Weifan)、清华哲学教授冯友兰、南开大学文学教授卞之琳(Bian ZhiLin)等。(27)

从1946年底到1947年1月初，为抗议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涉嫌强奸一名北大学生，出现了一系列反美游行示威活动。海军陆战队官兵的行为仅仅是直接的导火线。除此以外，学生还质问为什么美国

(23) 廖敏, 傅游. 西南联大与政府共同治理中的冲突和调适[J]. 山东高等教育, 2015, 3(06): 69-77.

(24) 胡素珊. 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44-50.

(25) 本刊特约记者. 血与理想李闻之死[J]. 观察, 1946(1): 22-24.

(26) 本刊特约记者. 血与理想李闻之死[J]. 观察, 1946(1): 24.

(27) 本期作者[J]. 观察, 1946(1): 3.

军事人员要留在中国, 他们是否真的没有站在政府一边参与中国的内战。在这一问题上所引发的势头, 发展成了一场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1947年5-6月间, 这场运动席卷了全国大多数主要城市的大学和中学。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所谓“学潮”, 与1948年4至6月间的抗议美国扶日运动汇合了。尽管经常涉及地方上的事件和人员, 但全国范围的学生抗议活动的基本动机都是一致的。学生的主要要求是, 立即结束内战, 结束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对国民党的支持, 把财政支出从以军事为重点转到以民用为重点上来。政府最初的反应是, 试图使这场运动转入另外的渠道。当局除了在某些学生运动最积极的学校里安插密探和特务外, 还让那些同情政府的学生, 如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 作为国民党的忠诚拥护者, 组织并领导学生的活动。但人们公认, 在全国最有名的学校中, 名气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学生领袖全都批评政府及其战争政策。

然而, 政府的决策者们认为只要学生内的极少数“真正的”共产党能被清除, 学生运动就能得到控制。(28)随之而来的严厉手段进一步弹压学生。学生的领导人, 尤其是大学自治会的领导, 是遭到一帮执法人员殴打、逮捕和绑架的主要对象。根据密探告密, 逮捕学生积极分子成了常见现象。积极分子和地下共产党嫌疑分子被列在黑名单上。这些学生即使不在校园中被抓走, 也会在夜间查抄学校宿舍时被拘捕。被捕和被绑架的学生常常干脆就“失踪”了。对于真正的共产党, 一旦他们的身份被查明, 死刑就是可以想见的惩罚。

“抗战虽然胜利, 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 经济凋敝, 整个社会, 已步近崩溃的边缘……”(29)在这样的逆境中, 战后年代的学术界只能试图保留过去10年军事、政治和经济动荡中幸存下来的东西。学术界的主要任务是收拾行装, 把学校迁回原来的校园。搬迁工作完成得极其迅速。例如, 1946年秋季学期, 南开大学在天津郊外的八里台(BaLiTai, TianJin)校园重新开学。800多名学生在原址恢复学习, 那里70%的建筑已被毁坏, 但一年后恢复工作就完成了大约30%, 而管理人员为重建学校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政府继续执行其统一和理解的政策, 把全部第一流大学, 包括南开在内, 变为国立, 增设和改组也在进行。对民国政府爱憎关系并由此所形成的政治道德一直是西南联合大学知识精英辩论和斗争的时代主题。

四、探讨与结论

共同的文化信仰是转型时期社会整合与社会稳定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直接动力。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说: “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样的信仰, 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 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 就根本无法存在。”(30)通过检视史料,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 民国“旧”与“新”的混合文教体制为西南联大的时代风骨的形成提供了政治保证。

民族国家政治具有内生性。近代的中国屈辱史促使中国最广泛的民族主义觉醒, 民族国家政治是建立在对民族文化强烈认同的基础上的。民国时期是一个政治思维发散的时代, 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生活理想和生存方式等也在逐渐发生改变。即物质的现代化成分和文化现代化的不同变化速度。与日益革新的物质技术相比, 文化现代化显得相当缓慢。(31)政权鼎革, 标志着政治中国的确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还面临一个文化中国的认同问题。由于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阶级关系与阶级利益的调整, 社会矛盾快速集聚, 社会稳定性差。如果不能协调、整合社会阶层分化与利益调整带来的冲突, 势必影响人们对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认同, 势必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最终威胁民国

(28) 杨奎松等. 中国的内战: 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4: 50.

(29) 我们的志趣和态度[J]. 观察, 1946(1): 3-4.

(30) 罗一娴. 中国社会转型期信仰危机及出路探析[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08(8): 8.

(31) 董锋等. 从多元到统一: 建国十七年高考改革文化生态嬗变研究[J]. 高教探索, 2017(8): 98.

政权的稳定。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调整和国家政治、经济方针政策的支持,更需要对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和共同文化信仰的重建。教育作为重建文化信仰的重要手段,学校作为文化传播的场域,一定要以传播民族文化为己任,为建设中国特色学校文化提供坚定的思想基础。⁽³²⁾

其次,民国知识精英担负多元“救助”者的角色为西南联大时代风骨的形成提供了组织保障。

民国时期知识精英参与国家治理的角色是多元“救助”者的角色。一批从香港学成归来的知识精英成为拥有港英法学士学位的律师、外科医生。一些知识精英在20世纪初年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当他们在国外学成归来时,便把这些思想带回中国,诸如“科学救国”等等。1912年开始,民国培育出了以作家、艺术家和其他非政府公职的职业人员等为代表的新城市知识阶层。知识精英从幕后走上台前,成为革命的政治领袖。20世纪20年代起,新知识精英开始关注教育主权的独立与解放。起初年轻的知识精英教育收权运动是零星的,在“一战胜利国”的国际影响下,民国教育收权运动的星星之火化为燎原之势。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在人类历史上一个人、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强弱,更多地依赖于教育。⁽³³⁾民国时期,由于北京政府各派军阀受到西方强国的幕后操纵,政治和外交上往往表现出“疲软”姿态。政治派别和军阀往往相互争夺现实利益,往往对教育失于有效控制,这也成为西方强国争相对华教育输入的可乘之机。

再次,联大时代风骨代代传,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云南这片土地无私的接纳滋养了南迁的三所高校的师生,不仅保存了进步知识分子的火种,也为云南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昆明这一祖国西南边陲的城市“一时文教之盛,屹然成为西南文化之中心”。⁽³⁴⁾联大是教授治校,有爱国、民主氛围,号称“民主堡垒”⁽³⁵⁾,大多数教授都追求正义,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并无好感。“一二·一”运动中,联大既要维护学校秩序,保护学生,又要与政府政府斡旋,承受住了各方压力。正如联大校训“刚毅卓绝”一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的命运始终与民族、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面对民族危亡时刻,联大师生几次挺身而出,投笔从戎。

纵观20世纪,知识分子作为国家的忠诚服务者和作为自由的学者专家这两个角色一直存在着对立,其冲突的焦点在于他们对政府的爱恨关系上。中国教育现代化是现实的,也是超越的。⁽³⁶⁾民国时期的知识精英不仅显示出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才能,还显示出他们能在一个政治上分化、文化多元化的旧秩序中所担任的角色。即使在战争期间迁移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时,北京和天津的教授仍继续认为他们自己既是现代西方学术自由、又是中国政治道德的楷模。他们极力保持学术民主与自由,在抗战艰苦条件下坚持赓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为国家培养人才,成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³⁷⁾

(32) 徐乐乐.国家、社会、民族三种共同体文化视野下的学校文化取向[J].教育与教学研究,2020,34(5):41-52.

(33) 闵维方.推进教育现代化 释放教育生机与活力[J].教育与教学研究,2020,34(1):1-2.

(34) 访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 一二·一运动树起第三座民主运动里程碑

(35) 昆明学生联合会赠西南联大“高声唱”歌咏队“民主堡垒”锦旗

(36) 纪大海.教育现代化:释放人的本质力量[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9,33(07):2.

(37) 【审校者点评:但当年许多追求民主、人权、自由、平等的知识分子,是否注意到他们被非政府组织洗脑而成为前门驱狼,后门引虎的潜在帮手,这些当事人在当时及以后几十年的遭遇,就引起了海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但该文所依靠的资料、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之严重局限之一,就是没有关注到这些内容并加以充分研究。】

English Title:

Love and h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style of times in the Sou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First Author) Yifan Cao; (Co-First Author) Zewei Deng; LiuMin;
(co-corresponding author) Chuangxin Sheng; (corresponding author) Feng Tong**

(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Guangdong; 2.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fic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Guangdong; 3. Marxism, Jinan University College, Guangzhou 510632, Guangdong; 4. School of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Guangdong)

Abstrac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Peking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Nankai University and other famous universities in China, as the source of resistance to Japanese imperialism, emphasized academic service to the national mission. Therefore, the Japanese army carried out a special retaliation against them. On July 29, 1937, Japanese aircraft bombed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The following day, Japanese artillery destroyed the remaining campus. Tsinghua University was plundered by the Japanese army. War forced higher education to give way to military work, but they continued their quest for academic purposes. Tsinghua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and Nankai took refuge in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at first, then moved to Kunming, Yunnan Province and established the Southwestern Associated Universit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Sou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faced with such problems as soil and water acclimation, lack of funds, lack of equipment and living difficulties, the professors of SWU continued to consider themselves as both modern academic freedom and model of political ethics in China, thus initiating a Kunlun also became the center of the “terrorist world” of Kunming intellectuals and had successively witnessed the tragic events of Li Gongpu and Wen Yiduo. The political morality formed by the love and h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vernment has always been the theme of the era of debate and struggle for intellectual elites in Sou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Keywords: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love and hate relationship; political morality; Times style

